学术专论

初使清朝之西藏格鲁派使臣车臣绰尔济与戴青绰尔济事迹考辨

宝音德力根

[摘要] 在早期清藏关系中，格鲁派高僧车臣绰尔济和戴青绰尔济因出使清廷、开辟格鲁派与清朝互使关系而闻名。因二人都是额齐格喇嘛门徒、均有伊拉古克三（意为“佛祖使者”）称号，致使学界长期将二人事迹混肴。车臣绰尔济是鄂尔多斯蒙古人，先后被鄂尔多斯贵族、喀尔喀札萨克图汗部贵族以及卫拉特准噶尔贵族供养。崇德二年所遣使臣库鲁克至盛京，捎去皇太极致藏巴汗的书信。崇德五年以四世班禅、五世达赖为首使者身份出使清朝，七年到达盛京。八年五月启程西返，顺治元年冬到拉萨，三年圆寂于喀尔喀。戴青绰尔济俗名晋巴嘉措，是出生于尼唐寺附近的藏人，可能是塔尔寺法台。崇德三年遣使清朝，五年代表顾实汗与车臣绰尔济一同出使清朝。车臣绰尔济返藏后，戴青绰尔济留在清廷，先后任皇太极和福临的“国师”。顺治四年戴青绰尔济返回西藏，不久在额齐格喇嘛故乡巴州修建了弘善寺，顺治十二年圆寂。文章还考证了车臣绰尔济和戴青绰尔济的转世，并纠正了学界混肴二人转世的错误。

[关键词] 清藏关系　车臣绰尔济　戴青绰尔济　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

[中图分类号] K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18）－04－0048－13

后金—清朝与西藏格鲁派互使关系的建立以及五世达赖喇嘛进京会见顺治皇帝是 17 世纪 30—50 年代中国以及东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其深远的影响延续至今。参与其间的，除关系双方顶层设计者后金—清朝最高统治者清太宗皇太极、清世祖福临以及西藏格鲁派高层四世班禅、五世达赖等外，还有一批格鲁派高僧充当重要角色，如额齐格喇嘛，是他于天聪四年（1630）首先向天聪汗建议遣察罕喇嘛出使西藏达赖喇嘛；如察罕喇嘛，同年奉天聪汗之命出使阿鲁喀尔喀，试图联络喀尔喀一同遣使西藏，后率清廷首批使臣于崇德八年（1643）随车臣绰尔济出使西藏；如西布札班第大诺们汗，早年以班禅、达赖密使身份来到后金，在清廷延请达赖喇嘛时多次往返于北京—拉萨之间。对于额齐格喇嘛建议天聪汗遣使达赖喇嘛以及察罕喇嘛出使阿鲁蒙古等事件，笔者已有专文探讨。本文则以清朝与西藏格鲁派建立互使关系为线索，重点探讨崇德七年初使清朝的车臣绰尔济和戴青绰尔济的事迹，以纠正学界混淆二人及其转世的错误。

[收稿日期] 2018-03-13
[作者简介] 宝音德力根（1963—），男，内蒙古大学蒙古历史学系教授，呼和浩特 010070；buyandelger@163.com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636-1720 年西藏、蒙古与清朝关系研究”（批准号: 07JJD770114）。

至于西布札班第大诺们汗事迹，则容另文探讨。

一、后金—清朝延请达赖喇嘛之缘起以及互使关系的建立

天聪四年（1630）七月，曾经引领蒙古右翼俺答汗皈依佛法、促成其与三世达赖喇嘛在仰华寺进行历史性会晤的格鲁派高僧额齐格喇嘛从蒙古喀喇沁万户投奔爱新国 / 后金，下榻天聪汗为其专门修建的馆舍。在这里，额齐格喇嘛致书天聪汗，建议派遣察罕喇嘛出使五世达赖喇嘛处。天聪汗接受其建议，很快派察罕喇嘛出使大兴安岭北之阿鲁诸部，试图联络阿鲁蒙古、阿鲁喀尔喀诸部，共同遣使。但是，察罕喇嘛岭北之行恰遇蒙古大汗林丹横扫大兴安岭北麓、讨伐阿鲁诸部及阿鲁喀尔喀之战事，因而未能与阿鲁喀尔喀接触，只好引领南下投奔爱新国 / 后金的伊苏特部返回。[①]

天聪八年七月，林丹汗病逝于甘肃打（大）草滩。闰八月，天聪汗得报，遣国舅阿什达尔汉等率兵探察哈尔汗子额尔克孔果尔消息，并谕之曰：

闻察哈尔汗之子额尔赫孔果尔，由彼来此。若距黄河西有十日路程，则派额尔德尼囊苏、哈尔松阿前往，若无信息，则不必往。令鄂尔多斯济农收其部众，令博硕克图汗子集土默特部人，各住于移营处，我出使唐古特、图白特部落，可取道于彼。[②]

显然，在1630年受挫后，天聪汗在积极寻找不经过喀尔喀而直通西藏的途径。林丹汗去世、部众溃散，他觉得可以通过右翼蒙古土默特、鄂尔多斯控制区直通青藏，而这条路线正是林丹汗控制蒙古右翼之前蒙古人朝佛的捷径。

天聪九年二月，爱新国 / 后金派多尔衮等四贝勒出征察哈尔，四月收服额尔克孔果尔部众；七、八月间在库库和屯北驱逐前来与明朝贸易的喀尔喀车臣汗使臣。[③] 年底，喀尔喀车臣汗与所属乌珠穆沁等部首领首次遣使爱新国 / 后金。天聪汗正欲招抚喀尔喀，因此不但重赏车臣汗等，还于天聪十年二月派出以卫寨桑为首的使团与车臣汗和谈。[④]

这年四月，爱新国 / 后金更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天聪汗皇太极被蒙古人尊为博格达汗。十一月前往喀尔喀议和之卫寨桑一行携喀尔喀车臣汗议和使团返回，月底，清朝派察罕喇嘛率六十四人使团与喀尔喀使臣一同出使喀尔喀，商议与喀尔喀共同邀请达赖喇嘛事宜。[⑤] 崇德二年（1637）八月，车臣汗致书博格达汗表示愿意与清朝一起邀请达赖喇嘛。这样，后金—清朝与喀尔喀联合遣使达赖喇嘛之事再度被提上日程。[⑥]

恰在此时，在卫拉特传教的顾实车臣绰尔济喇嘛派往清朝的使臣库鲁克等来到盛京。《清太宗实录》崇德二年十月丙午条载：

厄鲁特部落顾实车臣绰尔济遣其头目库鲁克来贡马匹、白狐皮、獭喜兽、绒毯等物。顾实车臣绰尔济初未入贡，闻上威德远播，至丙子年乃遣使，因路远，于是岁始至。

十一月十五日库鲁克等返回，急于与西藏达赖喇嘛建立联系的天聪—博格达汗，让库鲁克捎去写给图伯忒（蒙古人对西藏的称呼）汗的书信，希望库鲁克的主人顾实车臣绰尔济转交图

---

① 《爱新国 / 后金延请达赖喇嘛的最初尝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额齐格喇嘛致天聪汗书”解读》（待发表）。

② 《清太宗实录》卷 24，天聪九年闰八月庚寅；《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年，第 103 页。

③ 《清太宗实录》卷 24，天聪九年八月庚辰；《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第 154-155 页、第 186-188 页。

④ 参见《清太宗实录》卷 26，天聪九年十二月癸未；卷 27，十年二月丁丑；《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第 211-212 页。

⑤ 参见《清太宗实录》卷 32，崇德元年十一月己酉、甲子。

⑥ 关于崇德初清朝邀约喀尔喀共同遣使西藏事，参见达力扎布《清太宗邀请五世达赖喇嘛史实考略》一文，载《中国藏学》2008 年第 3 期。

伯忒汗。在信中，博格达汗告知图伯忒汗，“为使古之帝王所建政教统序不致中断，将遣使达赖喇嘛和图伯忒汗。”①

送走库鲁克之后，博格达汗着手与喀尔喀一同遣使西藏。但是，清朝与喀尔喀特别是札萨克图汗部的关系却开始恶化。崇德二年十一、十二月，喀尔喀车臣汗所属乌珠穆沁、浩齐特南下归附清朝。四年十月，苏尼特、阿巴噶亦归附清朝。② 清朝在与喀尔喀和谈的同时，引诱喀尔喀部众归附，使车臣汗大为不满。崇德三年二月博格达汗大张旗鼓地“亲征喀尔喀”，迫使前来库库和屯贸易的札萨克图汗北撤，引起双方空前的对立。③ 札萨克图汗返回后，主动与卫拉特和解，结束了双方自 1623 年以来敌对状态。崇德五年，喀尔喀与卫拉特制定了《蒙古—卫拉特法典》，协调对内对外关系，以应对清朝的武力威胁。

在这种形势下，强势的博格达汗认为，喀尔喀不会阻扰其延请达赖喇嘛，因此仍要求喀尔喀一同遣使。崇德四年十月清廷派以察罕喇嘛、额尔德尼达尔汉喇嘛为首的延请达赖喇嘛使团，携带博格达汗致图伯忒汗、达赖喇嘛的信件赶赴库库和屯，在那里等待喀尔喀所遣使团，准备来年春天青草长出后一同赴藏。④

但是，令清廷始料未及的是，喀尔喀方面放弃了与清朝一同延请达赖喇嘛的计划，使清朝使团在库库和屯苦苦等待无果后，只得返回盛京。⑤

此后，喀尔喀试图单独邀请达赖喇嘛，但未成功。⑥ 而清朝却迎来了四世班禅和达赖喇嘛的使臣顾实车臣绰尔济喇嘛。原来，当库鲁克将博格达汗给图伯忒汗的信带给其主人顾实车臣绰尔济喇嘛后，车臣绰尔济与其施主准噶尔贵族都日雅勒和硕齐⑦ 于土兔年即崇德三年八月来到拉萨觐见达赖喇嘛，并转达了博格达汗欲延请达赖喇嘛之意。面对如此大事，格鲁派上层反映敏捷，因为他们一直关注着迅速崛起的爱新国—清朝。年迈的班禅特意从扎什伦布寺来到拉萨，与达赖喇嘛商讨对策，最后由班禅作出决定：立即派遣自己的弟子车臣绰尔济出使清朝，看看强大的女真汗王能否担任格鲁派施主。⑧ 为显示使臣地位，班禅还特授车臣绰尔济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称号。⑨

铁龙年（崇德五年）新年刚过，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车臣绰尔济便携带达赖喇嘛致博格达汗的书信从拉萨出发。但是，由于喀尔喀与清朝对立，车臣绰尔济一度滞留喀尔喀。其间，在崇德六年八月，博格达汗就已获悉车臣绰尔济见到了达赖喇嘛和班禅，并被他们差遣前来盛京。为此，博格达汗致书停留在喀尔喀的车臣绰尔济，表达欲聆听达赖喇嘛法旨的急切心情，催促

① 《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第 1 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204 页。

② 参见《清太宗实录》卷 39，崇德二年十一月丁丑、十二月戊午；卷 49，崇德四年十月庚寅。

③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第 276-277、285 页；《清太宗实录》卷 40，崇德三年二月丙午。

④ 《清太宗实录》卷 49，崇德四年十月庚寅条；《博格达汗谕前往邀请有法术众喇嘛之额尔德尼达尔汉喇嘛等》载《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第 1 辑，第 266-267 页。

⑤ 关于喀尔喀背约未遣使一事，参见前引达力扎布文。

⑥ 据《五世达赖喇嘛传》（陈庆英等汉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 年）藏历铁蛇年（1641）五月喀尔喀、厄鲁特迎请达赖喇嘛的使臣色钦诺门汗（即丹津喇嘛）等随班禅大师来到拉萨（第 176-178 页）；水马年即崇德七年正月，喀尔喀左翼“多尔济嘉布”（即多尔济汗，指土谢图汗衮布多尔济）的代表邀请达赖喇嘛赴蒙古（第 182 页）；同年秋喀尔喀右翼俄木布额尔尼珲台吉（即第二任阿勒坦汗）来到拉萨，次年正月他邀请达赖喇嘛到蒙古，说这是“全体喀尔喀人的要求”。但是，对于喀尔喀汗王和高僧的邀请，达赖喇嘛一直没有正面回应。参见达力扎布《清太宗和清世祖对漠北喀尔喀部的招抚》，《历史研究》2011 年第 2 期。

⑦ 《清太宗实录》作都喇尔和硕齐（Dural qošiγuči），陈庆英已指出，他是准噶尔部巴图尔洪台吉之堂兄弟，参见其《明末清初格鲁派高僧咱雅班智达之事迹新探》（《两岸蒙古学藏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95 年，收入《陈庆英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年）一文。

⑧ 《五世达赖喇嘛传》第 213、163 页。

⑨ 李保文：《唐古特 · 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考》，《中国藏学》2005 年第 2 期。

他与普通商队一同经归化城前来盛京。[①] 崇德七年十月车臣绰尔济等抵达盛京，这时已距从拉萨出发两年又九个月了。[②] 崇德八年五月，车臣绰尔济回西藏复命，清朝派以察罕喇嘛为首的使团一同前往，顺治元年（1644）冬，顾实车臣绰尔济和察罕喇嘛等到达拉萨，各自完成了西藏格鲁派上层和清朝皇帝所付使命。[③]

二、清廷与班禅、达赖的共同使者车臣绰尔济

车臣绰尔济事迹见于萨冈彻辰《蒙古源流》和《五世达赖喇嘛传》。关于其出身，萨冈彻辰说他是“米纳克（Mina γ）人吉东 · 达尔汉 · 桑嘎思巴（Gedong darqan sanggasba）之子”[④]。在另一处，萨冈彻辰在叙述灭亡西夏之战时则说成吉思汗“杀死了失都儿忽汗，纳其名为古儿别真 · 豁阿之可敦，收复了被称作‘密纳克’的唐兀百姓”。[⑤] 可知，在萨冈彻辰看来，“密纳克”就是唐兀—党项人，这也符合西藏人称西夏人为 mi-nya γ（即 Mina γ—密纳克）的传统。但是，在车臣绰尔济时代，藏语的“密纳克”一词已不再指唐兀—党项人，而指甘青藏人。由此，研究者对车臣绰尔济身世有了不同说法，或曰“密纳克地方的蒙古人”；或曰“清代宁夏府和河套一带人”；还有人说“至于色臣绰尔济是藏人还是蒙古人，或者是党项后裔无从断定，然而将其视为出生于原‘西夏国’辖区的僧人还是符合历史事实的”。[⑥]

其实，根据文献记载，我们可以确定车臣绰尔济的身世。《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十七康熙三十四年（1668）十一月乙亥条有如下记载：

> 以卫征喇嘛等交通伊拉古克三，执而囚之。先是副都统阿南达以“喀尔喀王善巴长使多尔济有回子告之云：‘伊拉古克三前世僧徒，俱住居河套。尔等当防之，必有日受此辈之害’奏闻。上使阿南达将伊拉古克三僧徒内大弟子具遣至京。……[⑦]

这里出现的伊拉古克三是车臣绰尔济的转世，可称之为鄂尔多斯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二世，因交通噶尔丹，1697 年被康熙皇帝下令处死。从所谓“前世僧徒，俱住居河套”可知，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车臣绰尔济和他的转世都是河套鄂尔多斯人。同书卷一五五康熙三十一年年七月壬戌条又载：

> 先是，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请自察罕托灰迁其父吴巴什及弟子往居松阿喇布贝勒地方。上不许，令迁归化城。寻伊拉古克三以其父病故，奏请安葬。上遣理藩院笔帖式常寿偕往。……[⑧]

伊拉古克三二世之父名吴巴什，这个名字让我们想到了崇德年间鄂尔多斯台吉乌巴什（本名古塞尔图）。他曾多次代表鄂尔多斯济农出使清朝，并护送归降清朝的喀尔喀（当属札萨克图汗部）额参塔布囊至盛京。崇德三年（1638）十月吴巴什还与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车臣绰尔济一同受赏。[⑨]

吴巴什与伊拉古克三二世父子的住牧地察罕托灰（čaγan toqui），也应是其“前世”车臣绰

---

① 《博格达汗致车臣绰尔济书》,《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第 1 辑，第 308-309 页。

② 《五世达赖喇嘛传》第 163 页;《清太宗实录》卷 63，崇德七年十月己亥。

③ 《清太宗实录》卷 64，崇德八年五月丁酉;《五世达赖喇嘛传》第 213 页。

④ 乌兰:《〈蒙古源流〉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 年，第 469 页。

⑤ 乌兰:《〈蒙古源流〉研究》，第 226 页。

⑥ 参见马汝珩、成崇德:《伊拉古克三史事考辩》,《民族研究》1986 年第 5 期；达力扎布:《清太宗邀请五世达赖喇嘛史实考略》；前引李保文文。

⑦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年，第 357 页。

⑧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第 259-261 页。

⑨ 参见《清太宗实录》卷 39，崇德二年十月己未；卷 44，三年十二月乙丑、丁巳；卷 57，六年八月丁未；卷 63，七年十月壬戌等。

尔济的住地。察罕托灰指清初鄂尔多斯右翼中旗与宁夏府平罗所交界的黄河段（今乌海市海南区与宁夏交界）①，这里水草丰美、树木繁茂，早在北元时代已成为蒙古右翼鄂尔多斯万户牧地，属于麦力艮吉囊次子伯桑豁儿 · 狼台吉家族。引文中的“松阿喇布”正是狼台吉后裔，清代鄂尔多斯右翼中旗第三任扎萨克。② 早年狼台吉四子分家，形成四个鄂托克，其一竟然是“唐兀—唐古特”鄂托克。③ 因此我们认为，车臣绰尔济祖先就属于这个唐兀鄂托克，他们是 16 世纪初鄂尔多斯万户定居河套后征服的附近原党项人后裔，到了 17 世纪时早已蒙古化。因此，车臣绰尔济实际上是鄂尔多斯蒙古人。

对车臣绰尔济早年出家等情况我们还不知晓。但有迹象表明与最早在蒙古右翼弘扬佛法的格鲁派高僧额齐格喇嘛有关，他应是额齐格喇嘛早年的弟子。其修学的寺庙，也应在额齐格喇嘛的老家安多地区。17 世纪 20 年代，车臣绰尔济便返回故乡鄂尔多斯弘扬佛法，成为蒙古右翼鄂尔多斯万户卜失兔吉囊的供养喇嘛。甲子年（1625）卜失兔吉囊去世，次年其子图巴台吉在车臣绰尔济（色钦曲杰）等喇嘛带领下“浩浩荡荡”来到拉萨，向班禅和达赖喇嘛叩头祈福，在大召等寺院广发布施“贡献了数以万计的蒙古汉地所产物品”。达赖喇嘛授予图巴台吉“岱松珲台吉”称号；图巴台吉再次授予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瓦齐尔达喇”称号。班禅收车臣绰尔济为徒，并赐予“国师”（顾实）称号。④1628 年林丹汗征服鄂尔多斯后，车臣绰尔济前往喀尔喀、卫拉特，很快成为喀尔喀札萨克图汗部和卫拉特准噶尔部贵族共同供养的大喇嘛。1631 年车臣绰尔济率自己的新施主、喀尔喀札萨克图汗部阿海（阿克）岱青⑤ 和准噶尔墨尔根诺颜⑥ 一同来到拉萨，邀请达赖喇嘛到蒙古地方。⑦

如前文所述，崇德元年车臣绰尔济遣库鲁克出使清朝，次年十月到达。当时，和硕特与准噶尔联军早已应格鲁派邀请进入青海。因此车臣绰尔济是从青海派遣库鲁克的。其出使目的，诚如达力扎布所言是为了与明朝贸易，获得赴西藏朝佛所需物品。⑧ 由此我们认为车臣绰尔济遣使库鲁克并非是普通香客行为，其背后是出兵青海之和硕特、准噶尔贵族的意愿。库鲁克自青海出发的前一年即 1635 年，清朝征服了车臣绰尔济的家乡鄂尔多斯地区，掌控了鄂尔多斯蒙古与明朝的贸易权。因此，若没有清朝的批准，再也不能像往常一样与明朝贸易了。急于与西藏格鲁派联络的博格达汗，准许了车臣绰尔济的贸易请求，并让库鲁克带去给图伯忒汗的书信和欲延请达赖喇嘛的口信，要车臣绰尔济朝佛时转达。由此可知，车臣绰尔济也是博格达汗的使者。

库鲁克等于十一月返回，在喀尔喀见到了其主人车臣绰尔济。次年即崇德三年三月车臣绰尔济与达尔汉喇嘛及归化城土默特首领一同遣使，向博格达汗进贡：

北方阿禄喀尔喀部落查萨克图汗下达尔汉喇嘛⑨，塞臣绰尔济 [下] 俄木布、卓礼克图，归化城

---

① 《清圣祖实录》卷178，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丁巳；卷233，四十七年七月庚辰；卷256，五十二年八月丁丑等。近代以后，察罕托灰又称 qairab-yin tohui（海尔布之托灰），汉译海勃湾，1961 年建市，属伊克昭盟，1975 年与阿拉善盟乌达市合并成立乌海市。

② 松阿喇布祖父善丹系清代鄂尔多斯右翼前旗首封扎萨克，善丹曾祖即狼台吉。参见《金轮千辐》，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210 页。

③ 《蒙古源流》，第 363 页。

④ 《蒙古源流》，第 466-170 页；《五世达赖喇嘛传》，第 80-82 页。达赖喇嘛还用车臣绰尔济个人贡献的大量金银，重修了哲蚌寺的大经堂，参见《五世达赖喇嘛传》，第 81、90 页。

⑤ 关于阿海岱青这次赴藏以及在西藏的事迹，参见拙文《1631-1634 年出兵西藏之喀尔喀阿海岱青身世及其事迹》，《中国藏学》，2012 年第 2 期。

⑥ 即墨尔根岱青，准噶尔最高统治者巴图尔洪台吉弟。

⑦ 《五世达赖喇嘛传》，第 119-120 页。

⑧ 参见前引达力扎布《清太宗邀请五世达赖喇嘛史实考略》一文。

⑨ 又作“达尔汉囊（郎）苏喇嘛”，参见《清太宗实录》卷 42，崇德三年七月丁卯；卷 54，崇德六年正月丁丑。

土默特古禄格章京等遣使献名马、单峰驼、无尾羊、彩缎等物。使臣布颜图、杭古章京、额齐格喇嘛、托博克达赖、赵宜什巴汉察[1]、得木齐俄木布、阿果、根都、陶虎章京等各献蟒缎、倭缎、雕翎等物。[2]

"塞臣绰尔济"即车臣绰尔济，身份是喀尔喀札萨克图汗下喇嘛。当时博格达汗正亲征札萨克图汗，至博硕堆（今内蒙古正蓝旗宝绍代湖）驻扎。按清朝官方的说法，札萨克图汗闻博格达汗将亲征，"未得与明人交易，已于正月三十日仓皇而去"，而博格达汗出征则在二月初四日。[3] 但是，从车臣绰尔济使臣所献彩缎、蟒缎、倭缎等物可知，札萨克图汗与明朝进行了大规模贸易，车臣绰尔济等遣使进贡博格达汗是感谢博格达汗批准其与明朝贸易。

崇德四年八月，车臣绰尔济与施主都日雅勒和硕齐来到拉萨，"大发布施、供养甚丰，前后历时十余天"，仅达赖喇嘛一人就"取得了五、六千两白银，二、三千匹绸缎的大量礼品"。[4] 崇德五年春，车臣绰尔济被班禅授予"伊拉古克三胡图克图"称号，以班禅和达赖喇嘛使臣身份被派往清朝。车臣绰尔济首先随都日雅勒和硕齐到准噶尔，再转喀尔喀。这一年秋恰遇喀尔喀与卫拉特举行会盟，制定共同法典，身为喀尔喀札萨克图汗部和卫拉特准噶尔部大喇嘛的车臣绰尔济必定出席了会盟。在清朝与喀尔喀关系的冰点期，虽然身为达赖、班禅使臣，车臣绰尔济也不敢贸然行动，因而滞留喀尔喀近两年，直到崇德七年十月才到达盛京。

如前文所述，车臣绰尔济在盛京受到清廷隆重款待，停留长达八个月后于崇德八年五月踏上归程。但是这年八月博格达汗去世，九月顾实汗使臣到达盛京，建议博格达汗延请达赖喇嘛至京师：

厄鲁特部落顾实汗遣使奏言：达赖喇嘛功德甚大，请延至京师，令其讽诵经文，以资福佑。许之。[5]

于是顺治元年（1644）正月清廷派出延请达赖喇嘛的使臣，要他们与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会合，一同前往拉萨迎请达赖喇嘛：

遣使偕喇嘛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往迎达赖喇嘛，仍以书谕厄鲁特部落顾实汗知之。[6]

可知，直到这时车臣绰尔济仍停留在呼和浩特或鄂尔多斯，在与明朝贸易的同时，等待新皇帝的圣旨。二、三月，车臣绰尔济与顺治皇帝派出的延请达赖喇嘛使臣会合，前往拉萨，是年冬到达。[7] 途中，车臣绰尔济在喀尔喀得知清朝已经攻克北京，并要迁都北京。于是仍旧与归化城土默特部落和鄂尔多斯部落首领一同遣使庆贺：

归化城土默特部落章京古禄格等，鄂尔多斯部落济农薄博等，喀尔喀部落塞臣绰尔济，苏尼特部落腾机思、阿喇海等以贺迁都，各贡貂皮、驼马等物，酌纳之。赐宴，并赐雕鞍、弓矢、皮币等物。[8]

次年，车臣绰尔济回到喀尔喀。再次年即顺治三年车臣绰尔济在喀尔喀身染沉疴，《五世达赖达赖喇嘛传》这年冬记事作：

---

① 《清太宗实录》（卷 30）崇德元年六月戊戌条记土默特部落使臣名有"兆伊乌巴三察"，当即此人。"什巴汉察"系"乌巴三察"之误。

② 《清太宗实录》卷 41，崇德三年三月庚午。卷 43 九月庚辰条："赐贡驼马喀尔喀部落查萨克图汗下卫征朗苏，车臣绰尔济下卓礼克图，土谢图汗下博洛特扎尔固齐……马哈撒嘛谛塞臣汗下卫征朗苏、兀喇汉山津，阿霸垓部落济农下门绰浑，那木尔察尔下僧格等蟒缎、彩缎等物有差。""查萨克图汗下卫征朗苏"系因后文"马哈撒嘛谛塞臣汗下卫征朗苏"致误，应作"查萨克图汗下达尔汉郎苏"。因此，颇疑此条"塞臣绰尔济"与"俄木布"中间漏一"下"字。

③ 《清太宗实录》卷 40，崇德三年正月丁酉、二月癸丑。

④ 《五世达赖达赖喇嘛传》，第 161 页。

⑤ 《清世祖实录》卷 2，崇德八年九月戊申。

⑥ 《清世祖实录》卷 3，顺治元年正月壬戌。

⑦ 《五世达赖达赖喇嘛传》，第 213 页。

⑧ 《清世祖实录》卷 11，顺治元年十一月辛丑。

色钦曲杰嘉哇赤列巴在喀尔喀身染沉疴，喜饶喇嘛前来为他举行经忏法事。当他返回时，我们命他向大皇帝上表献礼。①

考之《清世祖实录》，车臣绰尔济于染病当年圆寂，其舍利由喀尔喀送至本部鄂尔多斯。②

五世达赖喇嘛称车臣绰尔济为“嘉哇赤列巴（rgyal bavi vphrin las pa）”，意为“佛陀（佛祖）事业者”或“佛陀（佛祖）使者”。与四世班禅给他的蒙古语胡土克图号“伊拉古克三（ilaγuγsan）”词义相同。学界以往将 ilaγuγsan 释为蒙古语“胜者”、“王者”，③只是出于蒙古语简单词义。其实，藏传佛教术语中这个词指“以释迦牟尼为首的镇压妖魔的现世千佛”④，唯有成就佛教大事业者才能拥有此号。班禅授予车臣绰尔济此号，说明格鲁派对清朝皇帝这个未来大施主的重视，而车臣绰尔济也没有辜负这一称号，成就了大事业，堪称现世千佛之一。

三、厄鲁特顾实汗使臣戴青绰尔济

以上是对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车臣绰尔济事迹的一些考证。但是，《安多政教史》却记载了另一位修建弘善寺的车臣绰尔济晋巴嘉措（Sbyin -pa rgya –mtsho）事迹，亦有“佛陀使者”、“佛陀事业者”即“伊拉古克三”称号：

巴州寺 (ba jovs dgon) 丹巴达吉林 (bstan pa dar rgyas gling), 由佛陀事业者车臣曲杰 (se che chos rje) 晋巴嘉措 (sbyin pa rgya mtsho) 修建。他生于尼唐寺 (nyi atng dogn) 附近。当时，按照四世班禅洛桑却吉坚赞和五世达赖喇嘛提出的满洲的皇帝势力日益强大去看看他能不能做我们的施主的指示，他于第十一饶迥的铁龙年 (1640) 前去穆克顿 (mug tun)。一到该地，立刻瑞相纷呈，他被皇帝尊为应供喇嘛。木猴年 (1644) 年底，东方皇帝的京城发生了时变 , 流贼夺取了大明崇祯皇帝的皇位，但是未能保持住，又丢失于满洲之手。他预言了顺治皇帝前去登上众敬王的皇位的日期时辰，并和皇帝一同到了北京。皇帝登上御座之后，为了使社稷稳固，他在皇城里的“僧山”的顶上修建了一座佛塔，塔前立有吉祥天女和狮面母两尊所依止的三根牛毛幢。这三根幢，现在的人们不知其来历，改成了三根汉式的长旗杆。在皇城外的后面，为了保佑社稷，修建了黄寺和佛经、佛像、佛塔。有一些时候，为了改变事情缘起，规定了在城墙上吹号角巡逻的制度，至今仍在奉行。⑤

《塔尔寺志》亦见相似记载：说晋巴嘉措（汉译本作“敬巴嘉措”）先后被博格达汗和顺治皇帝封为“国师”和“灌顶国师”，预言了顺治皇帝进入北京和即位时间。为了镇紫禁城内的凶煞，在“圣海”⑥山上修建了白塔；为社稷永固，在城外修建了黄寺。后来又奉敕建立了巴州弘善寺（汉译本误为“宏昌寺”）。⑦

这些记载使研究者迷茫，于是出现了将晋巴嘉措与车臣绰尔济相混，进而与席勒图库伦西布札诺门汗相混的一系列错误说法。⑧我们认为晋巴嘉措并非车臣绰尔济，而是 1642 年班禅、

---

① 《五世达赖达赖喇嘛传》，第 228 页。

② 《清世祖实录》（卷 30）四年正月壬戌条：“遣理藩院副理事官罗多理，赐故喇嘛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鞍马、缎匹、器皿、茶香等物。”（卷 32）五月乙丑条：“遣土默特部落德穆齐达尔汉囊苏送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丧，还其部，赏妆蟒、绸缎、银两等物。”马汝珩、成崇德将车臣绰尔济圆寂时间误为顺治四年，李保文已纠正。

③ 马汝珩、成崇德：《伊拉古克三史事考辨》；陈庆英：《西藏首次遣使清朝史实探讨》。

④ 《二十卷本 [蒙古语] 辞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285 页。

⑤ 智观巴 · 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等汉译：《安多政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 年，第 175-176 页；同时参考了陈庆英《西藏首次遣使清朝史实探讨》中的汉译。

⑥ “圣海”似为“琼海”的误译，与《安多政教史》“僧山”同指琼华海、琼岛（“琼华岛”的省称），因此“僧山”应是“琼山”的误译。

⑦ 参见罗桑楚臣嘉措著、郭和卿汉译：《塔尔寺志》，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225-226 页。

⑧ 有关批评，详见后文。

达赖所遣使团中的另一位高僧戴青绰尔济。为叙述方便，现将《清太宗实录》所载使团在京活动情况具引如下：

1. 崇德七年十月己亥：

图白忒部落达赖喇嘛遣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戴青绰尔济等至盛京。上亲率诸王、贝勒、大臣出怀远门迎之。还至马馆前，上率众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毕，进马馆，上御座，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等朝见，上起迎。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等以达赖喇嘛书进上，上立受之，遇以优礼。上升御榻坐，设二座于榻右，命两喇嘛坐，其同来徒众行三跪九叩头礼，次与喇嘛同来之厄鲁特部落使臣及其从役行三跪九叩头礼。于是命古式安布宣读达赖喇嘛及图白忒部落臧巴汗来书，赐茶，喇嘛等诵经一遍方饮，设大宴宴之。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及同来喇嘛等各献驼、马、番菩提数珠、黑狐皮、羢单、羢褐、花毯、茶叶、狐腋裘、狼皮等物。酌纳之。

2. 十月壬戌：

以朝鲜贡物分赐图白忒部落达赖喇嘛所遣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戴青绰尔济、戴青俄木布、鄂尔多斯部落台吉吴巴什、青俄木布、哲喇嘛……厄鲁特部落古木伊尔登下和尼图、奇尔山下图尔噶图、达赖巴图鲁下喀喇户济、阿巴赖山津、塔赖，都喇尔和硕齐下额尔德尼、桑噶尔寨伊尔登下额尔白黑、王什克下库尔墨、宾尔格齐诺颜下琐诺木、额尔克寨桑下吴兰、包虎寨桑下翁阿代、迈达里噶布楮下莽郭、噶尔马伊尔登下布尼、绰克图卫征诺颜下班第……等，缎布、腰刀、顺刀、貂皮、水獭皮、胡椒等物有差。

3. 崇德八年正月丙申朔：

召和硕亲王以下，梅勒章京以上及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戴青绰尔济等众喇嘛并朝鲜国陪臣，鄂尔多斯部落扎木苏台吉等，喀尔喀部落额痕图等，外藩十七旗官员，三顺王、续顺公下官员，贡貂皮虎尔哈部落羌图里等，赐宴于笃恭殿。

4. 五月丁酉：

先是，图白忒部落达赖喇嘛遣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及厄鲁特部落戴青绰尔济等至，赐大宴于崇政殿，仍命八旗诸王、贝勒各具宴，每五日一宴之。凡八阅月，至是遣还。赐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喇嘛及偕来喇嘛等银器、缎朝衣等物有差。又赐厄鲁特部落和尼图巴克式、阿巴赖、达赖，都喇尔和硕齐下额尔德尼巴图鲁、奇尔三下土尔噶图、阿巴赖山津等朝衣、帽、靴等物。上率诸王、贝勒等送至演武场，设大宴饯之。复以鞍马、银壶等物赐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喇嘛，仍命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辅国公硕托、满达海率梅勒章京、参政以上各官送至永定桥，复设宴饯之。遣察干格隆、巴喇衮噶尔格隆、喇克巴格隆、诺木齐格隆、诺莫干格隆、萨木谭格隆、衮格垂尔扎尔格隆等同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喇嘛前往达赖喇嘛、班禅胡土克图、红帽喇嘛噶尔马、昂邦萨斯下、济东胡土克图、鲁克巴胡土克图、达克龙胡土克图、臧霸汗、顾实汗处。致书各一函。

5. 八月己巳：

赐固伦额驸祁他特、弼尔塔噶尔诰命仪仗并赐固伦公主封册及仪仗。上以第五女固伦公主下嫁内大臣和硕额驸恩格德尔之子索尔哈。和硕亲王以下，甲喇章京以上与朝鲜国世子及戴青绰尔济、洪承畴，外藩庆贺来朝科尔沁国和硕土谢图亲王巴达礼、和硕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多罗巴图鲁郡王满朱习礼、多罗郡王班第、固伦额驸祁他特、弼尔塔噶尔、巴雅思护朗、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续顺公沈志祥俱朝服列崇政殿。

从 1-4 条可知，西藏使团由两位地位相当的高僧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和戴青绰尔济率领。第 4 条还透露了戴青绰尔济的身份——厄鲁特部落的绰尔济。原来西藏使团是由格鲁派高层班禅、达赖和厄鲁特顾实汗等共同派遣。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和戴青绰尔济分别代表僧俗界，随他们同来的还有厄鲁特和硕特、准噶尔及其附属喀尔喀右翼兀良哈鄂托克大小贵族的使臣，他们正是 1635 年出征青海的三股势力。因此，戴青绰尔济系顾实汗等人的代表无疑。

第 5 条记载则告述我们：崇德八年五月车臣绰尔济返回西藏时，戴青绰尔济并未同行，而是留在盛京，成为博格达汗座上宾，所谓“国师”。一年后博格达汗驾崩，顺治皇帝即位，他自然成为顺治皇帝的“灌顶国师”，并随顺治皇帝入北京，开始了《安多政教史》所记的一系列政教活动。

因为戴青绰尔济与车臣绰尔济一同出使清朝，还担任清朝两位皇帝的国师，因而继车臣绰尔济之后，也获得了“佛陀使者—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称号，因此可以称其为“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戴青绰尔济”。《安多政教史》和《塔尔寺志》所记晋巴嘉措就是戴青绰尔济，所述事迹基本可信，只是前一书将其名号“戴青绰尔济”误写为“车臣绰尔济”了。这是因为两位高僧名号相近，且有共同开辟清廷与格鲁派高层互使关系的经历所致。

在 1640 年与车臣绰尔济一同出使清朝前，戴青绰尔济已经遣使清朝，与清廷取得了联系。崇德三年十二月厄鲁特尹扎胡土克图所遣使臣格隆赛桑额尔格布习（厄尔格布什）和什勒图绰尔济喇嘛所遣使臣哲喇嘛等来到盛京贡马，受到隆重款待。① 尹扎胡土克图（三世温萨活佛洛桑 · 丹津嘉措）是 1635 年被四世班禅派往厄鲁特请兵的格鲁派使臣，与四世班禅关系密切。② 而“什勒图绰尔济喇嘛”就是戴青绰尔济。《清太宗实录》崇德四年四月戊申条记载有如下：

赐厄鲁特部落格隆赛桑、什勒图绰尔济喇嘛所遣哲喇嘛，喀尔喀部落卫征贝勒下和兑褚阳等白金有差。

与之对应的《内国史院满文档案》崇德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戊申）条记载则作：

赐格隆赛桑银一百两；喀尔喀札萨克图汗卫征贝勒下和兑储阳银五十两；厄鲁特部落喇嘛戴青绰尔济下哲喇嘛银五十两；从格隆赛桑来朝蒙古炮手二人各银十两，额伊图银二十两。③

可知什勒图绰尔济喇嘛就是戴青绰尔济，其使臣哲喇嘛，后来随戴青绰尔济再度来到盛京，见前引《清太宗实录》崇德七年十月壬戌条记载。

尹扎胡土克图和戴青绰尔济是继车臣绰尔济后第二批遣使清廷的厄鲁特高僧，因与清廷有这层关系，戴青绰尔济和车臣绰尔济才被班禅、达赖和顾实汗选为第一次出使清朝的为首使臣。

在《五世达赖喇嘛传》里没有记载戴青绰尔济出使清朝之事，但所记“厄鲁特曲杰（绰尔济）”似指戴青绰尔济：

厄鲁特曲杰将我请到戒律经院的僧众集会的首座上。大皇帝的金字使者克雅喇嘛及不少僧俗人员也来到这里，一些香客也随之而来。钦差们将皇帝的圣旨和赏赐物品颁给我，并发放了大量的布施和礼品。④

记事系于火猪年 (1647) 年冬。考之《清世祖实录》，克雅喇嘛⑤ 是这年即顺治四年（1647）二月所遣，可知此前戴青绰尔济已经离开北京，返回西藏。他在清廷任所谓“国师”的时间不过四年。

顺治五年十月戴青绰尔济仍以“厄鲁特部落锡勒图绰尔济”身份遣使清朝贡马。⑥“锡勒图绰尔济”即“什勒图绰尔济”，亦即戴青绰尔济。

---

① 参见《清太宗实录》卷 44，崇德三年十二月己丑；卷 45，四年正月辛酉；卷 46，四月戊申；卷 46，五月丁巳和丁丑；卷 48，八月丙戌等。

② 参见乌云毕力格：《关于尹咱库土克图》，《内蒙古大学学报》1994 年第 1 期。

③《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第 414 页。

④《五世达赖喇嘛传》，第 235 页。

⑤《清世祖实录》卷 30，顺治四年二月丙戌：“初，达赖喇嘛、班禅胡土克图、巴哈胡土克图、鲁克巴胡土克图、伊尔札尔萨布胡土克图、萨思夏喇嘛、额尔济东胡土克图、伊思达格隆胡土克图、诺门汗各上书请安，并献方物。至是，遣喇嘛侍卫、格隆等存问，各赐金玉、器皿、雕鞍、甲胄等物。”康熙本“喇嘛侍卫”作“喇嘛虾”，“虾”对应《五世达赖喇嘛传》中的“克雅”，系蒙古—突厥语“kiya”的音写，意为“怯薛”、“侍卫”。

⑥《清世祖实录》卷 40，顺治五年十月癸丑。

顺治六年三月他遣戴青温布率厄鲁特顾实汗子使臣来朝贡马：

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下戴青温布、达尔汉囊苏等暨厄鲁特部落顾实汗子下达赖吴巴什、温布塔布囊等来朝贡，宴赉如例。①

“戴青温布”即崇德七年随戴青绰尔济出使清朝的“戴青俄木布”，这次遣其出使的应仍是戴青绰尔济，所以“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就是戴青绰尔济，说明这次遣使时他已经从班禅（或达赖）那里获得了“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称号。 此外，《清世祖实录》顺治八年（1651）三月辛卯条有：“宴伊拉古克三喇嘛贡使于礼部”的记载，此伊拉古克三喇嘛应即“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戴青绰尔济”。

戴青绰尔济大约在1655（顺治十二年）圆寂，《五世达赖喇嘛传》火猴年 (1656) 二月记事中有：

……同时我为一位卸任戒师前去担任厄鲁特曲杰饯行。

这位卸任戒师应是接替戴青绰尔济到青海厄鲁特担任“厄鲁特绰尔济”即“什勒图绰尔济”。“什勒图”（širegetü）又译“席勒图”、“西勒图”、“锡勒图”等，一般指格鲁派寺庙的法座（法台、赤巴）或住持。只是我们还不能肯定戴青绰尔济是格鲁派哪个寺庙的法座，从其出身塔尔寺推测，他应是该寺的法座。

四、学界对两位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及其在蒙古转世的混淆

至此，我们认为基本理清了两位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事迹。其一是车臣绰尔济，唐古特氏鄂尔多斯蒙古人，可能是额齐格喇嘛早年弟子。他在17世纪20年代就已成为鄂尔多斯济农等贵族供养的喇嘛，尤与狼台吉家族关系密切。1625年他随图巴台吉觐见四世班禅与五世达赖，被四世班禅收为弟子。1628年，他避林丹汗前往喀尔喀、厄鲁特传教，成为札萨克图汗部和准噶尔部供养的大喇嘛。1640年被班禅授予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称号，出使清朝。1644底他返藏复命，1645年回到喀尔喀，1646年圆寂。其二是戴青绰尔济，出生在西藏尼唐寺（位于拉萨曲水县西南）附近，藏人，俗名晋巴嘉措。17世纪30年代，戴青绰尔济在额鲁特传教，以“额鲁特什勒图绰尔济”或“额鲁特绰尔济（曲杰）”闻名。1638年首次遣使清朝，1640年奉顾实汗之名与班禅、达赖使臣车臣绰尔济一同出使清朝。1643年，车臣绰尔济返藏复命，戴青绰尔济则留在清廷，先后担任清太宗、清世祖的所谓“国师”。1647年戴青绰尔济返回西藏，获得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称号，并在额齐格喇嘛的故乡巴州建立弘善寺。由此推测，戴青绰尔济也应是额齐格喇嘛早年弟子。②

在开辟清朝与西藏格鲁派早期关系的历史上，两位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居功至伟，自然引起学界注意。但是，相关研究往往将二人事迹混淆，致使很多历史真相模糊不清。最先把二人混淆的是意大利著名藏学家杜齐（Giuseppe Tucci），是他首先将《清太宗实录》中的“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戴青绰尔济”连读，视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与戴青绰尔济为一人。③《五世达赖喇嘛传》汉译本在一处注文（第166页）中最初将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与车臣绰尔济视为二人，说：“实录所记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似即藏文都日雅勒和硕齐，戴青绰尔济似即藏文车臣曲杰，确否待考。”这实际上将拉克古三胡土克图车臣绰尔济分别与其施主都日雅勒和硕齐（都喇尔和

① 《清世祖实录》卷43，顺治六年三月己巳。

② 活跃在17世纪30—50年代后金/清朝与西藏格鲁派关系舞台上的察罕喇嘛、色臣绰尔济、戴青绰尔济以及西布札喇嘛等高僧均与额齐格喇嘛关系密切，这一点应引起我们的重视，从而重新审视将蒙古与后金/清朝拉入格鲁派势力范围的这位上师。

③ 参见杜齐著，李有义、邓锐龄汉译：《西藏中世纪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油印本，第117页。

硕齐）和另一位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戴青绰尔济相混了。在另一处注文中（第 230 页）虽然正确指出车臣绰尔济（色钦曲杰）是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却将其误认为“顾实汗之侄厄齐尔图台吉之义子”，令人费解。厄齐尔图第三子系戴青绰尔济之转世，因而也称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详见后文），并无其他“义子”是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而厄齐尔图之父拜巴噶斯却有“义子”为胡土克图，即著名厄鲁特高僧咱雅班智达。看来，汉译者本意似乎认为车臣绰尔济即咱雅班智达，只是将咱雅班智达义父拜巴噶斯之名与其子厄齐尔图相混了。这种错误仍见陈庆英论文中，他虽然首先注意到了《安多政教史》关于佛陀事业者（即伊拉古克三）车臣曲杰晋巴嘉措记载，却未能发现该书所记晋巴嘉措法号“车臣绰尔济”系“戴青绰尔济”之误，加之坚信戴青绰尔济即咱雅班智达，因而实际上完全混淆了二人，甚至三人事迹。① 日本学者若松宽利用《安多政教史》有关的记载，正确指出额齐格喇嘛在家乡建立的寺庙系法轮寺，而非弘善寺。但是自己却将弘善寺的建立者误为车臣绰尔济，并将其事迹与西布札喇嘛事迹相混。这些皆是因混淆车臣绰尔济与戴青绰尔济而产生的错误。② 陈小强虽然发现戴青绰尔济又称“什勒图绰尔济”，却依然延续了陈庆英、若松宽的错误。③ 李保文对车臣绰尔济事迹研究有不少突破，却仍误让车臣绰尔济为晋巴嘉措，只是比较谨慎地表示，晋巴嘉措与伊拉古克三胡图克图车臣绰尔济的关系有待进一步考证。④

如前文所考，车臣绰尔济、戴青绰尔济分别于 1646 年、1655 年圆寂。随后他们的转世活佛（胡土克图）以“伊拉古克三胡图克图”之名出现在他们曾经传教并得到过供养的蒙古地方。

车臣绰尔济的转世在他圆寂后的次年即 1647 年首先出现在鄂尔多斯。如前文所述他就是鄂尔多斯台吉吴巴什子，是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二世，因交通噶尔丹，被清廷处死，由此这一胡土克图系统终结。此外在喀尔喀也出现了车臣绰尔济的转世，《清世祖实录》顺治四年四月丙子条载：

喀尔喀部落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等遣使来贡，宴赉如例。

这个喀尔喀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极有可能是前一年圆寂的车臣绰尔济在喀尔喀札萨克图汗部的转世，应是喀尔喀札萨克图汗部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系统之始祖。

戴青绰尔济的转世则出现在了额鲁特，《清世祖实录》顺治十四年四月丙子条载：

厄鲁特部落敖齐尔图台吉子伊拉古克三班第大胡土克图等贡驼马。宴赉如例。

“敖齐尔图台吉”即顾实汗兄拜巴噶斯长子厄齐尔图彻辰汗，“伊拉古克三班第大”是其三子中的幼子。据《塔尔寺志》记载，巴州活佛晋巴扎措的转世名“扎巴扎喜”，当即此人。⑤ 早年当格鲁派势力微弱时，有两位高僧在额鲁特辛勤传教，具有了很大影响。他们是准噶尔统治者巴图尔洪台吉的上师尹扎（温萨）胡土克图和和硕特统治者顾实汗、厄齐尔图台吉叔侄的上师戴青绰尔。1635 年，当格鲁派面临生死存亡关头，正是他们奉班禅大师之命引领各自的施主出兵青藏，推翻了辛夏巴氏藏巴汗政权，控制了整个青藏高原和厄鲁特、喀尔喀蒙古。于是，两位上师的转世活佛分别出现两大施主家族：一个是巴图尔洪台吉子噶尔丹，另一个是厄齐尔图台吉子扎巴扎喜。

学界由于长期混淆两位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因而很自然地混肴了其转世，甚至混淆两个

① 《明末清初格鲁派高僧咱雅班智达之事迹新探》;《西藏首次遣使清朝史实探讨》,《中国藏学》1998 年第 1 期。

② 《〈锡勒图库伦喇嘛传汇典〉初探》,《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韩儒林先生纪念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汉译文见《蒙古学信息》1999 年第 4 期。

③ 参见其《试论西藏政教上层与满洲清政权的初次互使》(载《西藏研究》1992 年第 2 期);《金巴嘉措喇嘛事迹考》(《民族史研究》1999 年)。

④ 李保文:《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考》,《中国藏学》2005 年第 2 期。

⑤ 《塔尔寺志》，第 226 页。

甚至三个不同转世系统及其世次，产生了很多错误。王辅仁将车臣绰尔济视为敖齐尔图台吉子伊拉古克三班第大胡土克图，实际上将戴青绰尔济的转世与车臣绰尔济相混了。① 马汝珩、成崇德反对王辅仁之说，却将戴青绰尔济的转世敖齐尔图台吉子误为车臣绰尔济的转世，因而将其列入鄂尔多斯伊拉古克三一系，称其为二世，而将真正的车臣绰尔济的转世、鄂尔多斯的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二世误为了三世。而在具体探讨所谓敖齐尔图台吉子“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二世”名号时又将其与喀尔喀额尔德尼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拉尊阿旺丹津（马、成二氏误读为“纳旺丹增”）相混淆。② 若松宽纠正了马、成二氏将敖齐尔图台吉子与喀尔喀额尔德尼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相混的错误，考证出阿旺丹津系喀尔喀著名的赛因诺颜图蒙肯后代。③ 但是，受自己将前世两位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相混的错误和马、成二氏的影响，视阿旺丹津为晋巴嘉措的转世。④ 其实，喀尔喀有两个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系统，其一是车臣汗部额尔德尼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阿旺丹津属于这一系统，与车臣绰尔济、戴青绰尔济两位伊拉古克三胡图克图无涉。⑤ 其二是前面提到的札萨克图汗部伊拉古克三胡图克图，当与车臣绰尔济有关。车臣绰尔济曾是札萨克图汗的供养大喇嘛，其转世极有可能出现在札萨克图汗部。

References

Awangluosangjiacuo.“Wushi dalai lama zhuan”(Biography of the Fifth Dalai Lama) (Chen Qingying deng hanyi) (Translated by Chen Qingying et al.). Beijing: Zhongguo zangxue chubanshe, 1997.

Chen Qingying. “Mingmo qingchu gelupai gaoseng Zanya Banzhida zhi shiji xintan”(The new research on the activities of Zanya Banzhida, the high lama of Gelug Sects in the late Ming and the early Qing).Chen Qingying zangxue lunwenji (The essays of Tibetan studies of Chen Qingying). Beijing: Zhongguo zangxue chubanshe, 2006.

Chen Qingying.“Xizang shouci qianshi qingchao shishi tantao”(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ibetan first envoy to Qing dynasty). Zhongguo zangxue (Tibetan studies of China) (1) 1998.

Chen Xiaoqiang.“Shilun xizang zhengjiao shangceng yu Manzhou Qingzhengquan de chuci hushi” (The research on the first mutual envoys between the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upper class of Tibet and Manchu Qing regime). Xizang Yanjiu (Tibetan studies) (2) 1992.

Chen Xiaoqiang.“Jinbajiacuo lama shiji kao”(The research on the activities of Jinbajiacuo Lama). Zhongyang minzu daxue: Minzushi yanjiu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the studies of ethnic history) 1999.

Dalizhabu. “Qingtaizong yaoqing wushi dalai lama shishi kaolue”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Qingtaizong’s invitation for the Fifth Dalai Lama).Zhongguo zangxue (Tibetan studies of China) (3) 2008.

Dalizhabu. “Qingtaizong he Qingshizu dui mobei kaerkabu de zhaofu”(The appeasement of Qingtaizong and Qingshizu for Khalkha in the north of Gobi desert). Lishi yanjiu (The history studies) (2) 2011.

Li Baowen. “Tanggute·Yilagukesan hutuketu kao”(The research on Tanggute·Yilagukesan Khutugtu).Zhongguo zangxue (Tibetan studies of China) (2) 2005.

Ma Ruheng,Cheng Chongde. “Yilagukesan shishi kaobian”(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Yilagukesan).Minzu yanjiu (Ethnic studies) (5) 1986.

“Qingchu neiguoshiyuan manwen dangan yibian”(Translation of Manchu archives in the academy of national history in

---

① 王辅仁：《达赖五世朝清考》,《西藏研究》1982 年第 3 期。

② 前引马汝珩、成崇德文。马、成二氏的错误来源于马赫玛（Zahiruddin Ahmad）《十七世纪汉藏关系》（“Sino-Tibetan relation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一书，罗马，1970 年，第 276 页。

③ 据《阿萨拉克齐史》（民族出版社，1984 年，第 132-138 页），其世系如下：图蒙肯第十一子桑噶尔寨，桑噶尔寨长子伊勒登和硕齐，伊勒登和硕齐幼子即额尔德尼伊拉古克三胡图克图。

④ 《伊拉古克三考证》载若松宽著，马大正等编译：《清代的历史与宗教》，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 年。

⑤ 据《五世达赖喇嘛传》（第 195、1144 页）、《安多政教史》（第 149 页）及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汉译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517-51 页 8）有关记载，阿旺丹津是喀尔喀车臣汗的供奉喇嘛塔尔寺的嘉哇曲杰扎喜顿珠的转世，1679 年才被五世达赖授予“额尔德尼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称号。

the early Qing Dynasty).Beijing: Guangmingribao chubanshe,1989.

"Qingneimishuyuan mengguwen dangan"(Mongolian archives in the secretarial academy of Qing Dynasty) (1). Hohhot: Neimenggu renmin chubanshe, 2003.

"Qinzheng pingding shuomo fanglue"(The strategy of the emperor's military expedition and the pacification in northern desert). Beijing: Zhongguo zangxue chubanshe, 1994.

Wakamatsu Hiroshi."'Xiletukulun lama zhuan huidian'chutan" (The basic study of "The Collection of Xiletukulun Lama's Biography"). Neilu yazhou lishi wenhua yanjiu: Han Rulin xiansheng jinian wenji (The studies of Inner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the anthology on the memory of Han Rulin). Nanjing: Nanjing daxue chubanshe, 1996.

Wulan. "'Menggu yuanliu' yanjiu" (The research on Erdenin Tobchi). Shengyang: Liaoning renmin chubanshe, 2000.

Zhigongba·Gongquedanbaraojie. "Anduo zhengjiao shi" (The history of politics and religion of Amdo) (Wu Jun deng hanyi) (Translated by Wu Jun et al.) Lanzhou: Gansu minzu chubanshe, 1989.

The Activities of Chechen Chorji and Daichin Chorji on their Mission as the First Envoys of the Tibetan Gelug Sects to the Qing Dynasty

Baoyindeligen (The Mongolian History Department,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buyandelger@163.com)

Abstract: Chechen Chorji and Daichin Chorji, the high lamas of Gelug sects, were very famous in the earl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ing dynasty and Tibet, because they came to Qing as envoys, and opened the mutual envo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elug sects and the Qing. Because both lamas were the disciples of Echige Lama, and both had the title of "Ilagsun" (the messenger of the Buddha), scholars have confused their activities for some time. Chechen Chorji was an Ordos Mongolian, who was enshrined and worshiped successively by the nobility of Ordos, Jasagt Khan of Khalkha and Jungar of Oirat. In 1637, he sent the envoy, Kuluge to Shengjing, and Kuluge took a letter from Huangtaiji to Tsangpa Khan. In 1640 Chechen Chorji took the trip to the Qing court as the envoy of the fourth Panchen Lama and the fifth Dalai Lama, and arrived in Shengjing in 1642. In 1643, he returned to the west and arrived in Lhasa in 1644, and he passed away in Khalkha in 1646. Daichin Chorji had a common name called Jinbajiacuo, he was a Tibetan who born near by the Nitang Monastery, perhaps near the platform of Kumbum Monastery. In the 1638, he dispatched the envoy to Qing, and he went to the Qing court with Chechen Chorji as the representatives of Guush Khan in 1640. After Chechen Chorji went back to Tibet, Daichin Chorji stayed in Qing court, and became the "State Preceptor" of Huangtaiji and Fulin successively. Daichin Chorji went back to Tibet in 1647, and soon after he built the Hongshan Monastery in Bazhou, the hometown of Echige Lama. Daichin Chorji passed away in the 1655. This article also examines the reincarnation of Chechen Chorji and Daichin Chorji, and corrects the mistake of previous scholars who confused the reincarnations of the two lamas.

Keywords: relationship between Qing dynasty and Tibet; Chechen Chorji; Daichin Chorji; llagsun Khutugtu